

千古医圣

张仲景

千古医圣张仲景
的传奇一生

中国传统医学的源头来自朴素的劳动实践，经过历代的积累，历史终于选择了张仲景，在中国医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对后世影响如此深远的人物。

亦非 编著

中一华一圣一人一文一化一系一列



京华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华／圣／人／文／化／系／列



千古医圣

张仲景

亦非 编著

中华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古医圣——张仲景 / 亦非编著.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502-0024-1

I. ①千… II. ①亦… III. ①张仲景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7296 号

千古医圣——张仲景

编 著 ☐ 亦 非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 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 64258472 64251790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290 千字

印 张 ☐ 16 印张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02-0024-1

定 价 ☐ 29.00 元

京华版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前 言



陈寅恪曾倡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而中国医药的文化史同样源远流长。“红炉炭火煲药食，满屋弥漫药草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精致的保健生活享受，同样也充满了人文关怀与诗性的滋润，传统中国医学中蕴藏着不少思想与学术资源，还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个性化的药物欣赏与使用过程中，还有药物的命名、药引的归纳与理解都充满了智慧。目前，对于传统药物学中的科技因素有不少人重视、研究，而中医中的人文因子同样耐人寻思。

在中国浩瀚的文化长河中，中医文化源远流长，至今依旧发挥着旺盛的生命力，从古至今，中医的魅力不断吸引着全世界人们好奇的目光，中医也成为中华 5 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不灭的火炬，在她的光辉照亮下，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秉承优良传统、前赴后继，救死扶伤，为世界医学作出杰出贡献。

中国传统医学的源头来自朴素的劳动实践，经过历代的积累，历史终于选择了张仲景，在中国医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对后世影响如此深远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前人乃至后人称道的种种品格，他集杰出的才智、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于一身。张仲景在继承他人医学成就的基础上，重视实践，勇于创新，撰写

千 古 医 圣 张 仲 景

了一部光秉史册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从此，建立了最具特色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和医疗体系，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他的著作和儒家的《论语》、《孟子》一样成为经典，本人也成为万世载道的“医圣”。



前 言

目

录

第一章 张仲景的时代 / 1

第一节 张仲景所处的社会现实 / 3

第二节 科学态度与神权迷信之争 / 9

第二章 医圣的传说 / 13

第一节 立志医术 / 15

第二节 博采众方 / 18

第三节 精医有道 / 22

第四节 万世景仰 / 25

第三章 真实的医圣 / 27

第一节 张仲景生卒年限 / 29

第二节 张仲景“太守”之迷 / 32

第四节 其他传说 / 36

第五节 伤寒论 / 38

第六节 《金匱要略》 / 43

第四章 南阳楚汉文化 / 47

第一节 南阳楚地 / 49

第二节 楚文化特质 / 58

第三节 南阳汉文化的发源 / 61

第四节 现存汉文化遗产 / 63

第五节 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南阳名人 / 65

第五章 张仲景思想的渊源 / 69

第一节 阴阳学说的影响 / 71



第二节 对《内经》的继承与发展 / 78

第三节 《神农本草经》的影响 / 85

第四节 仲景学说对《难经》的继承与发展 / 88

第六章 辨证论治的哲学思想 / 93

第一节 整体观念 / 95

第二节 尊重内因致病的客观实际 / 103

第三节 以正邪相争作为客观依据 / 106

第四节 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 / 111

第七章 六经辨证体系 / 117

第一节 六经的涵义 / 119

第二节 六经的实质 / 127

第三节 六经传变理论 / 131

第四节 六经辨证与八纲的关系 / 137

第八章 医方之祖 / 149

第一节 组方的原则与变化 / 151

第二节 张仲景的剂型 / 157

第三节 制法、煎法、服法 / 161

第九章 张仲景和中医文化 / 171

第一节 中医的简史 / 173

第二节 中医的儒文化 / 179

第三节 中医的释文化 / 196

第四节 中医的道文化 / 202

第五节 天人合一的核心观 / 211

第六节 中医的实践 / 213

第七节 中医的科学精神 / 216

第八节 中医与其他传统文化 / 219





第一章

张仲景的时代

第一节 张仲景所处的社会现实

秦汉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城市如长安、洛阳、南阳等地相当繁盛。南阳郡的宛市与长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并称为全国六大都市。到了东汉初，由于光武皇帝刘秀出身南阳豪强地主之家，南阳遂成为帝乡，号称南都，逐渐成为东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南阳一时间成为商贾聚集地区。东汉以后更加繁盛，初平中（公元190年—193年），袁术初据南阳时，户口已达数百万。

当时南阳人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刘秀是南阳大豪，他的二十八宿是南阳一带门阀士族，所以南阳一带豪强势头大，兼并土地严重。加之南阳战略地位重要，扼守要冲，南北干戈，一定冲击宛城，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导致南阳一带战火不断，饥馑连年，疾疫大行，死亡无数。

张仲景一生经历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少帝、献帝四朝，这期间朝廷政治昏暗，土地兼并严重，各地民众起义不断，群雄也相互争斗，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立政权后，为防大权旁落，对外戚的防范极严，所以，刘汉政权机制运转还属正常。章帝死后，其子继位为和帝，年仅11岁，难以视政，只好由其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母后听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亲属以为辅助，其兄弟窦宪等掌握实权，





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但是渐渐年长的和帝开始对其舅父窦宪等不满起来，于是，宦官郑众等趁机为和帝谋划，将窦宪党羽一举收捕，夺回政权，郑众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宦官开始得势，这也是宦官与外戚的第一次交锋。此后，东汉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争夺打斗中摇来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摆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日益腐败，豪族地主势力不断膨胀。朝廷皇权旁落，外戚、宦臣交替专权，“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范曄《后汉书·黄琼传》）外戚、宦官的党徒典据州郡，贪赃枉法。“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地方大吏“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范曄《后汉书·左雄传》）“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曄《后汉书·党锢列传》）

西汉以来实行的用人选官制度，通过“举孝廉”等措施为各级政府推荐优秀人才，在野的士大夫、太学生、郡国生徒等知识分子得以有机会进入仕途。但自外戚宦官把持朝廷以来，原有的选官制度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裙带关系、凭借财产的众寡和权门的高低。

“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要人之书；或父兄显贵，望门而辟命”（葛洪《抱朴子》）

桓灵帝时期，政治腐败残酷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常年不断的党锢之祸。因为部分朝廷的官僚与在野的士大夫、太学生和郡国生徒因为不满仕途被阻，而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反对外戚宦官的政治势力，最终被镇压，被宦官外戚打击或招致杀身之祸、株连九族，或流放边疆。世人噤若寒蝉，皆言朝不保夕。



当时的官场上乌烟瘴气，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奇特现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反映了当时官吏的素质低劣和选官制度之混乱。

东汉末年轻贵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相互攻伐，抢夺纷争，长期混战，特别是自董卓之乱到赤壁大战，连续十九年间战火不熄。黄巾起义，此起彼伏，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疫病流行，民病夭亡，如《后汉演义》载：“献帝驾至洛阳，然被董卓毁尽，瓦砾成堆，荆榛满目，百官无处安身，无粮可因……除尚书郎以下，亲自出外采稻，煮食充饥，饿死甚多。”京都洛阳“城郭为山林，庭院生荆艾”，无人知道这是帝王家。

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在兴平元年至建安四年（194年—199年）之间，发生了食粮恐慌，尤以三辅、河北、江淮等地为最严重。刘表自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占据荆楚以来，当地较少受到干戈之扰，相对稳定的局势使得各地流民陆续来到这里。根据《三国志·魏志·卫凯传》中卫凯给荀彧的信中所载，仅关中一带流入荆州的难民，就有十几万户。

东汉桓帝时，刘陶上疏疾呼：“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抒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范曄：《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自封君王侯贵戚豪富尤多有之，假举骄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渐作衰矜之意。苟崇聚酒徒无行之人，传空引满，啁啾骂詈，昼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殴击责主，入于死亡，群盗攻剽，劫人无异。”（《潜夫论·断讼》）

地方官吏更是为虎作伥。“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怨结，无所控告……”（《潜夫

论·三式》)

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听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之。首尾不救，淫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民转死于沟壑矣。”（仲长统《昌言·损益篇》）

统治者的压榨、抢掠，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愈来愈多的农民无法继续在本乡生活下去，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流民”，“永元五年……三月……康宣，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天仓赈禀三十余郡……”“六年……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赈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十二年春二月……诏贷被灾诸郡民种粮，赐下贫、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范曄：《后汉书·和帝纪》）

不仅如此，人祸未了，天灾又不断。从公元二世纪中期开始连续灾荒。元嘉元年（151年）夏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范曄：《后汉书·桓帝纪》）桓帝永兴元年（153年）适值天灾，黄河泛滥为患，“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范曄：《后汉书·朱乐何列传》）“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范曄：《后汉书·桓帝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有近百万人倾家荡产，流浪在外，河北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延熹九年（166年），豫州发生大饥荒，饥饿而死者将近一半，“至有灭户者”，（范曄：《后汉书·桓帝纪》）到灵帝时“河内（河南武陟）人妇食夫，河南（河南济阳）人夫食妇”。（范曄：《后汉书·虞傅盖藏列传》）

这是一个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的时代，全国各地出





现一片“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范曄：《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的凋零残破景象。贫困与饥饿，导致人民体质下降，抵抗力减低，由此而使各种传染病得以长期广泛流行。根据史料统计，当时人口平均寿命只有 37 岁。

当时是“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植：《论疫气》）自建宁四年（公元 171 年）以后至中平二年（公元 185 年）的 15 年间，常有“大疫”流行，史书所载大疫就有五起，建宁四年（公元 171 年）“三月大疫”，嘉平二年（公元 173 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公元 179 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公元 185 年）“正月大疫”。

这还不包括史料中未记载的局部区域性的疫情。

至于张仲景所在的中原地区同样灾害严重。《襄阳府志》、《后汉书·袁术传》记载：“初平三年术据南阳，建安二年僭号自称仲家，时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后汉书·孝献帝纪》载道：“兴平元年（194 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夹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裴松之于建安元年注）

建安年间“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才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志·张绣传》）。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作《七哀诗》描述离长安至荆州的一路惨象：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构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文选》卷二十三）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广韵》列南阳张氏十四望，但在遭受连续不断的疾病袭击下也人丁迅速凋敝。《魏志·王修传》中曾有一段关于南阳张氏的描述：“王修……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举舍。奉举家得疾病，无相视者；修亲隐恤之，病愈乃去。”大约是在初平元年（190年）之前。张仲景自己也说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论·自序》）

在遭遇罕见疫情时，统治者却不闻不问或束手无措。“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祸及患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涕泣。痛夫！”

张仲景希望医术能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他因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故而“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第二节 科学态度与神权迷信之争

在中国古代，医术和巫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分家的，西汉医学的发展也还没有脱离神权与巫觋的控制，在当时社会上方士、巫祝很有影响力，而病患者因为笃信巫术而延误治疗的大有人在。

同时，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正统。这种汉儒思想有别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前者以儒家为主体，揉合儒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并继承“天人合一”思想，衍生为“天人感应论”，为了巩固皇权，并使之神化。新儒学提出的“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匀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贵，故易为治也。”（《春秋繁露·制度》）宣扬君权神授和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并竭力维护三纲五常的道德观所组成。

而到西汉末年，随着社会危机的日趋严重和政治斗争的尖锐激烈，原有的儒学价值体系崩溃，统治阶级越来越崇尚谶纬迷信，西汉末期出现了风靡一时的“谶纬之学”。到了东汉，由汉光武帝刘秀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致使谶纬之说大为流行。谶纬是董仲舒神化儒学的发展，附会儒家经义，再加以宗教神学观解释。东汉是谶纬之学盛行的年代，统治阶级各种重大问题的决定，都以谶纬来决定。于是“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范曄：《后汉书·张衡传》）甚至“巧慧小才伎数之人”，也“增益图书，矫称谶记”（范曄：《后汉书·桓谭传》）。



由于神学泛滥，致使东汉末期医界混浊。巫祝利用迷信方式，通过祈祷祭祀，行医治病。大疫之年，人们祈求祷告、悬符画录、卜筮咒禁、敬天保命。

东汉谶纬学的代表作《白虎通义》试图使谶纬更加符合经学体系。《白虎通义》继承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世界观，大量引用图谶纬书解释经义，是一部集儒学与谶纬于一体的神学化的法典。它强调“天”对五星的绝对主导关系，即强调神权的绝对主宰地位，用以比附“臣”对“君”的从属关系。它利用阴阳五行说，进一步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宣传尊卑等级思想，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法则，宣扬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绝对亘古思想。这种把经过董仲舒改造加工的孔孟儒学同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的产物，严重阻碍了当时科学的发展，也成为医学发展的绊脚石。谶纬的“天人感应”的“人副天数”说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教，以及对古代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篡改，把阴阳五行学说神秘化，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与此同时，以王充为代表的朴素唯物者，不信鬼，不信邪，顽强地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论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其焦点仍是制天命和尊天命、革新和守旧、重实践和天才论之间的斗争。这种思想碰撞深刻地影响着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

出生于“细族孤门”的王充，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识，“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范曄：《后汉书·王充传》），他经三十年的努力，写成一部《论衡》，其中表达了反对谶纬迷信，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王充针对谶纬学提出了“气”一元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认为“气”是构成客观世界最基本的元素，它“广大无垠，不生不灭”。所谓天地者，

